

臺灣公民文化之研究：以北高兩市公民的價值觀為例

江明修 陳建寧*

摘要

台灣出現南北差距問題的過程涉及「個人」與「社會」因素，國內多從經濟、社會、政治、政府等個別、單一與行為角度來探討，忽視民眾的主觀認知與感受「重北輕南」無形的公民文化之分析。本研究擬以台灣公民文化作為社會系統機制來回應經濟、社會、政治和政府的南北差距現象，並從判斷分析觀點，採用價值觀面向，以社會判斷理論（Social Judgment Theory, SJT）為研究方法，探討北高兩市民眾日常生活所呈現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以及反映所在的社會結構，並提出價值觀實證研究架構作為未來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從文獻中選取言論自由、社會認同、發展效率、社會安定與收入增加等 5 項指標，作為「價值觀」之決策參考變數，反應民眾心中的優先性。分析發現高雄市民眾呈現物質主義價值觀傾向（72%）高於台北市民眾（65%），顯示高雄市在現代社會中保有傳統社會之現象；台北市民眾呈現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傾向（32%）高於高雄市民眾（21%），顯示台北市具有現代社會基礎提升到後現代社會之傾向。這種價值觀認知的差異，將為南北差距問題關鍵之所在，如能掌握藉由經濟發展與公共事務管理教育的提升有助於社會移轉考驗，化解南北差距問題現象。

關鍵字：台灣公民文化、價值觀、判斷分析、社會判斷理論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教授

台北市木柵郵政 1-15 號信箱（02）29393091~67402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管理學博士

高雄市三民區大福街 40 巷 52 號 89c003@mail.kscg.gov.tw （07）7477611~1440

壹、緒言

在台灣近 50 年的經濟發展之下，每人國民所得從五○年代平均 80 美元成長到二○○○年代平均每人 15,000 美元，影響所及從物質生活普及到各層面的現代化、世俗化與民主化，市場經濟、環境保護、普世重視成就導向的社會流動，社會逐漸走向進步、公平與正義的發展(Esman, 1997；孫震，2001)。北高兩市民眾在富裕社會生活領域的基礎條件上，基於資訊傳播、知識教育與道德倫理等個體認知要素進行社會互動，呈現出複雜與多樣的價值傾向，改變民眾的人際關係與社會文化狀況，經由社會結構與互動關係，具體反應呈現為經濟、社會、政治、政府等外顯現象行為。在政府操作政策選擇與管理運作下，逐漸在台灣南北出現明顯「差距」問題，不斷的困擾政府與民眾。

南北差距問題涉及「個人」與「社會」因素，盧曼認為當代全社會可分化出經濟、法律、學術、政治、宗教與教育等功能系統，期待社會系統解決全社會中的某一特定問題，這與人的心理系統需求有關聯性（魯貴顯譯，1998:174；黃鈺堤，2000）。然而探討北高兩市客觀的「南北失衡」社會現象，國內多從經濟、社會、政治、政府（汪明生、戴雅明，2004；張茂桂等，1993；王甫昌，1994a，1994b，1998；朱雲漢，2003；吳重禮、李世宏，2004）等個別、單一與行為角度來探討，忽視民眾的主觀認知與感受「重北輕南」無形的「公民文化」之分析（陳建寧，1999，2007a）。建構公民文化的社會系統受到個體的心理系統影響，個體認知主要強調共享的知識與信念的價值系統，成為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現象。盧曼也談到「價值」在社會系統中的歷史變更（Luhmann,1986）。

公民文化是社群或地方發展中，具有享權利、盡義務的公民所表現出的價值觀（汪明生、江明修、陳建寧、馬群傑，1999，2006），價值是公民文化的核心，文化因素是造成南北差異愈來愈大的原因（遠見雜誌，2004 年 5 月號，215 期），由於價值觀具有主觀判斷的基本信念，國內研究價值問題，從大專學生價值觀（王叢桂，1993；翁淑緣，1995；李元墩，1998）、工作價值觀（黃同圳，1993；吳鐵雄等，1996；王叢桂，2002；洪瑞斌、劉兆明，2003）等觀點，詮釋價值的抽象觀念結構，較少從事有關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實證研究（瞿海源，1993）。

本研究以公民文化作為社會系統機制回應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南北差距現

象，從判斷分析觀點，採用價值觀面向（Inglehart, 1990）以社會判斷理論（Social Judgment Theory, SJT）（Hammond et.al, 1975a）為研究方法，引用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以「系統/環境」觀察世界的觀念，系統是自我生產的系統，而環境則是系統所不是的東西（Luhmann, 2000）。在此觀念之下，透過個體自己而非環境，衡量北高兩市民眾的價值觀，並從其偏好與判斷結果，反映所在的社會生活領域，是否為「傳統社會¹」、「現代社會²」與「後現代社會³」結構（呂乃基，2004；汪明生，2005），以及提出價值觀實證研究架構作為未來研究之參考。

貳、價值觀相關研究

文化是以價值為核心，個體之間的道德、誠實、正直與關懷，以及群體之間的包容、體諒、尊重與公平的價值體系，成為社會進步基礎的核心價值。民眾的價值觀傾向，經由社會關係與社會結構，進而影響經濟系統與政治系統的認知，成為由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移轉考驗的關鍵。本節將回顧整理研究所用文獻，作為建構操作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指標的價值觀之理論基礎。

一、個體認知系統與價值觀

個體在多元社會中面對日常事務的決策情境，大多必須同時考慮多個相關屬性資訊，個體認知是由資訊如何儲存成知識之結構，以及知識如何運作之歷程，綜合建構為認知系統。它需由外界一連串的刺激或資訊，經由評估社會性標的程序產生情感價值，藉由整合情感價值的結果，儲存為功能性記憶，作為知識系統的一部份，這是如何將資訊儲存成為知識的結構問題，並以「知識系統」來描述個人的認知架構。

個人在形成認知判斷過程中，對於外界刺激進行理解、記憶，主要受到「標的」如食物與溫暖的「生物性標的」、家庭與自我尊重之「社會標的」，以及社會與宗教和科學相關的「抽象標的」等所指引，產生不同的判斷準則，並依據本身累積的知識經驗，而產生不同的價值體系（Anderson, 2003）。其中屬於個體利益

¹傳統社會是以農、林、漁、牧業為主的自然經濟，重視「生存」價值，主要透過自然經濟的交換，強調情感至上的價值觀念、比較重視血親與親屬的關懷、私的意識的人際關係與穩定和諧的社會。

²現代社會是以工業和服務業占絕對優勢的市場經濟，重視「安適」價值，主要透過市場經濟的交換，強調法律、契約合同的人際關係，重視理性主義、個人自由、進取發展、效率與能力至上等觀念，比較重視公平意識，以高度的理性和自由性來處理參與公共事務。

³後現代社會是具有現代化發展基礎的高技術、研發、資訊與知識的全球化經濟的社會，重視「安適」價值，主要透過後市場經濟（價值、倫理、道德）的交換，強調以法律基礎上情感的人際關係，重視個體與群體、競爭與和諧，理性與情感之文化面。

的價值形式包括權力、成就、享樂主義、激勵與自我成長等；屬於群體利益的價值形式包括仁慈、傳統與順應等（Schwartz,1992）。

個體認知系統中的知識運作，也是歷程的問題，對於相同事件，有不同的偏好和判斷結果，以模式來描述判斷分析的過程，並解釋判斷的結果，此種架構和過程即是認知上的「知識系統」。教育是提升個體知識的關鍵，在道德教育上，應強調批判思考、公民價值與多元教學途徑（Lee, 2004），以及公民與社會課程上，藉由公共事務管理教育培養民眾價值觀、邏輯思考、辨別是非、重視利他與嚴守正義、批判事物、表達意見，作為判斷事物能力的智慧基礎，這將有助於價值、道德、文化與政治之間的平衡，防止各種政治性意識與文化傳統過度影響干預公民教育。

多元社會具有分歧性、動態性和複雜性之環境系絡，解決南北差距議題因涉及「個人」與「社會」因素，除藉助現代管理、政策及區域等科學領域分析方法、理論模式外，尚需探討人民的主觀價值認知，即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構成民眾認識與判斷公、私事務的本質，也是民主與多元社會的基礎，在民主政治社會中，公民必須持有與實踐的公民價值觀，包括尊重他人的政治地位、國家認同之政治價值，法律、公平規則的法律價值，誠實、勤勉的經濟價值，以及關懷、合作的社會價值與容忍、尊敬的文化價值（Zhang and Lee, 2002）。找回公民文化中道德倫理的社會核心價值，正向回饋提升整體社會，帶給社會真正的和諧，弭平「南北差距」社會現象，表現在人際信任價值觀（Inglehart, 1990）與社會資本（Putnam,1993）觀點。

二、公民文化變革對個人及社會系統之影響

（一）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是代表著一種「理性-行動者」的政治文化模型，在其中吾人分享共同的空間、資源與機會，並且負責管理在陌生人群之間的互動關係，而這些陌生人群構成一個公共體，藉著這種互動關係創造出一種共同公益的觀念（周陽山，2002 引自 Boulding, 1988）。在民主國家中，大多數民眾可利用集體的發言權形成對菁英監督批判之輿論，對菁英表達公共服務需求意向引導政府制定政策，藉由參與體制運作監督政府執行政策，檢驗菁英領導的政治效能感等面向（Almond and Verba,1963；Box,1998），區分為公民（參與型，積極的公民）、順民（順從、臣民型，搭便車）與愚民（地域、村民型，看門狗）。

北高兩市社會存有內部結構的差異，台北市在中產階級人口比率為 35.16% 高於高雄市的 28.60%；相對地，高雄市勞工階級人口比率為 14.16% 高於台北市的 8.37%，這可從社會人口和經濟產業等因素解釋「北藍南綠」的政治現象，想改變「南北差距」社會價值發展態勢，唯有從公民文化中提升個人的道德辯證與群體的倫理節制，凝聚出一種休戚與共的社群主體性，並以大多數人的最大福祉與互利共存為考量，經由教育提升民眾的知識水準，促使不同社會階層在理性互動中以寬容、理解與創新，自律與他律結合調適，將社會多數屬於「愚民」、「順民」的認知模型，轉變成占多數的「公民」社會，才能由傳統社會結構到公平與正義的現代社會。

（二）經濟發展影響社會結構與文化變遷

台灣近 50 年來的經濟發展帶來都市化、運用科技、職業專門化與官僚化快速增加，改造社會存在與運行的物質基礎，進而產生影響個體或群體之行為、態度與價值觀，改變群體現象互動，再形塑另一層「社會價值」趨勢的社會制度，主要由農業到工業，工業再到服務業社會結構變遷。

傳統社會是以農、林、漁、牧業為主的自然經濟或生命能源占絕對優勢的社會，強調知足常樂、天賦至上、情感至上的價值觀念。成員不具有公的意識，比較重視血親與親屬的關懷及私的意識，以「生存」價值為特性，重視如物質主義者所需的生理需求與安全需求等低階需求之滿足。傳統社會的多數不具備功能、專門化的政府組織體制，缺乏制定各種法規條例的專業與效率、規範的政治決策，在威權體制之下，由菁英領導權力集中，只讓少數民眾有權利參與政治。

現代社會是以工業和服務業占絕對優勢的市場經濟或非再生資源占絕對優勢的社會，主要透過市場經濟的交換，包括教育水準提升、增加所得收入及累積財富等重要核心變化特徵。強調法律、契約合同的人際關係，以規範標準調節人際關係，成員重視理性主義、個人自由、進取發展、效率至上、能力至上等觀念，經由個人的能力和努力來決定社會的角色和地位，比較重視公平意識，以「安適」價值為特性，重視如後物質主義者所強調的自我表達、言論自由、知識、美學、自尊及生活品質等高階需求之滿足。

民眾在現代社會生活中以高度的理性、自由性、開放性、競爭性及強烈感參

與公共事，公眾受到後物質主義者價值觀與認知動員⁴（cognitive mobilization）影響，經由兩黨制衡增加自主性來挑戰菁英，從菁英領導政黨團體策動民眾參與投票的政治，轉為強調以議題討論形式的公眾參與，追求社會功能分工、效率導向，隨之降低科層政黨的忠誠度，因而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藉由熟練的參政技巧（political skills），由政治動員式微的「菁英領導」（elite-directed）轉向為議題導向的「導引菁英」⁵（elite-directing）（Inglehart, 1977）。

經濟發展也會導致文化變遷，在現代社會裏，民眾的教育水準以及政治參與技巧的提升，帶來「知識流動」（knowledge flow）影響從個體到群體在價值觀與人際互信上，以及社會結構在認知上形成不同的文化變遷特質。由個人層次來看文化變遷是一種微觀觀點，主要反映提升教育水準與工作性質的變遷，從簡單日常例行性的操作，轉變成需要專業知識及獨立判斷之工作任務，表現個人歸屬、尊嚴自我瞭解的價值，這不僅提升個人的參政技巧，而且也提高參與地方事務的政治技能（Huntington, 1991）。個人系統層次經由社會多元意識則是一種人際互信、人際衝突與人際學習，包括利益、價值、事實與權力，推演至社會系統的層次上，就顯現在兩性差異、社會規範、政治議題、認知動員與政治參與型態等系統層次變遷結果，並以生活滿意度、人際信賴感、以及對改革的支持度等三項指標作為公民文化的表徵（Inglehart, 1977），如圖一。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公民文化，主要將民眾認知行為視為社會資本的一環，主要將資源鑲嵌社會結構進入或流通於目的的行動，它是一種來自個人、組織、社區與社會關係之資源，也是一項價值的資產（Lin, 2001），表現支持經濟成長與政府績效的關鍵因素有信任、規範、公民參與網路，以及規則等等（Putnam, 1993）。社會資本程度高，建立公民社會可能性越高（江明修、鄭勝分，2004），並以廣大公共利益為依歸的公民社會成為社會資本的基本面向，亦即有眾多的公民推廣正面價值、監視政策走向、推動社會公平與進步的社會，促進民主治理的發展（Uslaner, 1999），也是公民相互間信任而願意彼此合作，這種公民文化表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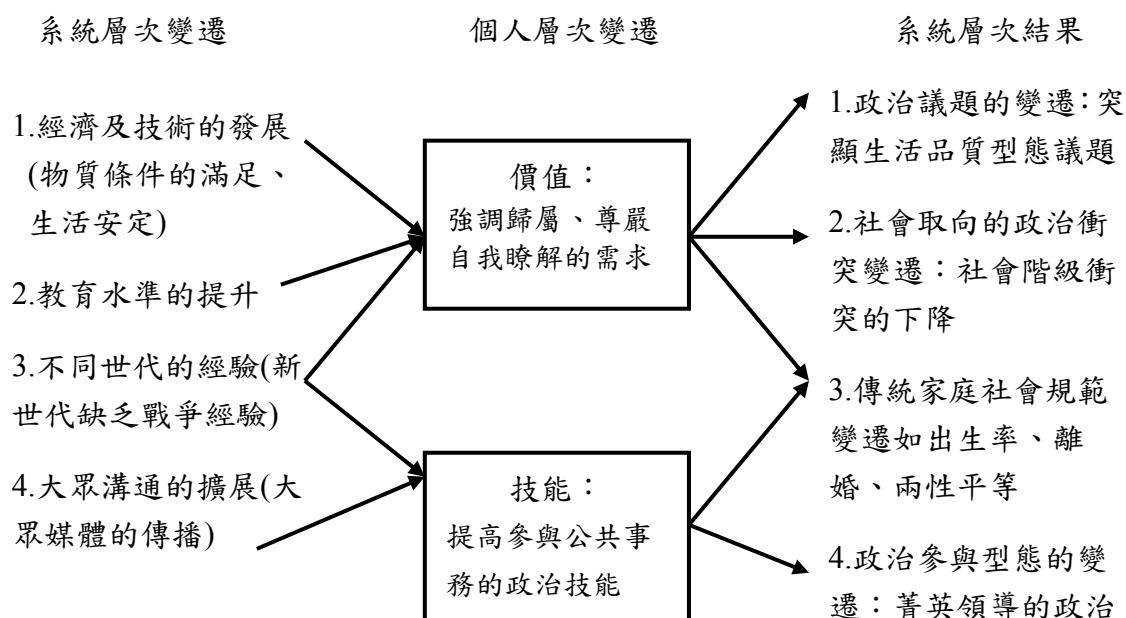
⁴ 認知動員是社會動員的層面（Inglehart 1970, 1977；Dalton 1984a；Dalton, Flanagan, and Beck 1984），其意是指社會經濟體系中存在各種不同階層，因教育與資訊較高層次，藉著現代組織成型與溝通網的發達，激發民眾的心理認知促進個人參與地方公共事務進行社會動員過程。

⁵ 在社會動員過程中有組織的市民要求公平分配的機會，Inglehart (1977)認為參與政治程序方式：(1). 菁英領導是一人獨斷或少數人壟斷的威權式決策，藉「由上而下」決策過程管理地方公共事務，乃威權或專制社會之運作模式。如二十世紀初群眾參與之組織，工會、教會與政黨等，均屬於階級式組織。(2). 導引菁英即利害關係人，以自我表達與議題為導向，藉由本身教育水準、自我判斷的技巧，主動「由下而上」方式參與公共事務決策交由政治精英等少數決策者負責將其共識落實、具體化，乃多元民主社會運作之常態模式。

相對影響社會、國家之間的關係。

北高兩市社會階層結構如果沒有出現相應的現代化轉變，將急劇擴大南北差距區域不均衡，價值變遷（文化移轉）在由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中扮演關鍵要素，主要將傳統社會民眾所重視生理、安全需求的私欲、私意識優於公意識、以及效率重於公平等物質主義價值觀，提升到現代社會民眾所重視言論自由、環境保護的公益、公意識優於私意識，以及效率公平兼顧等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因而，社會功能是以社會位置為重心的正常運作，原由具備特定才能、特殊訓練和技術的「菁英」，以「統治、剝削」階級垂直區分的社會地位，但因社會多元的發展、穩定與知識普及而使各階層間充滿發展與開放競爭，必須調和各種不同才能的人，安排在適當的社會位置上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Davis and Moore, 1945），進而由菁英轉為多元，並以「合作、互惠」功能水平區分的專業分工社會。北高兩市社會從存有省籍族群與階級的關係，轉向鼓勵民眾創新發展與機會立足點真公平的功能分工，進而提高以議題導向的導引菁英參與取代菁英領導的政治動員，期由社會移轉考驗邁向現代社會發展之路（汪明生，2005）。



圖一公民文化變革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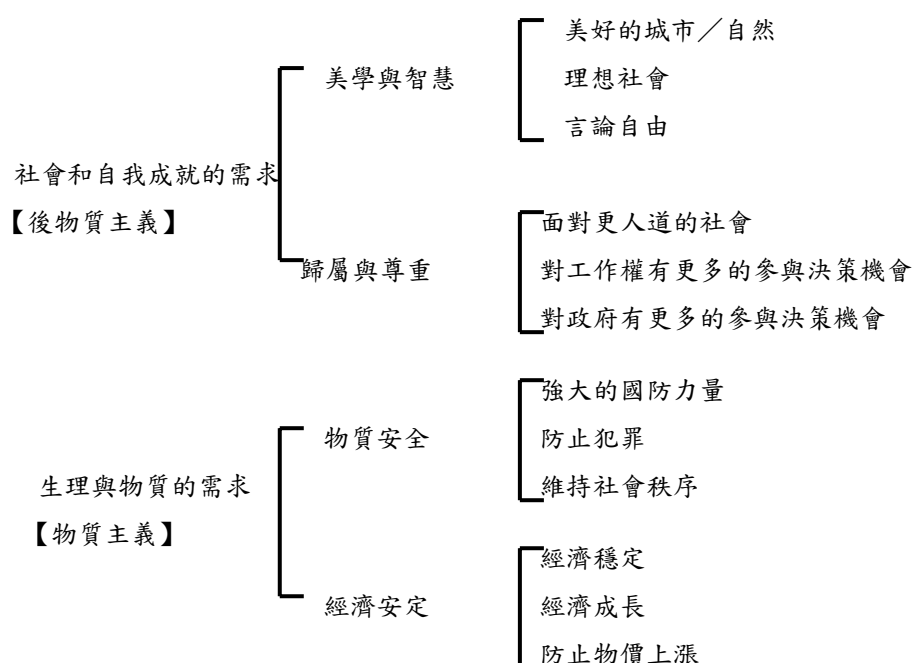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整理自 Maslow (1954), Inglehart (1977), 汪明生等 (2006)

三、價值變遷指標：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

Inglehart (1990) 依據 Maslow (1954) 的需求層級理論發展而成的文化移轉 (價值變遷) 理論, 並提出兩項假說: (1) 稀少性假說 (scarcity hypothesis): 它與經濟理論中的邊際效用遞減是相似的, 強調個人價值的優先順序係反映其所處的社經環境, 並優先滿足相對匱乏的事物, 民眾的基本需求或價值的優先順序與其稀少性程度有關。(2) 社會化假說 (socialization hypothesis): 個人價值觀雖受社會環境影響, 但個人的基本價值則是反映他的成長時期, 個人在成年之前, 即已完成人格發展且價值觀也固定。在成年時期若身處於經濟繁榮期, 其價值觀傾向後物質主義; 若身處於經濟落後或衰退期, 其價值觀傾向物質主義。

Inglehart 以美學與智慧、歸屬與尊重、物質安全與經濟安定等四項需求層級, 並以十二項目作為調查測量價值優先順序, 檢視民眾的物質主義 (materialist) 及後物質主義 (post-materialist) 價值觀, 如圖二。後物質主義者強調美學與智慧、歸屬與尊重等二項需求層級, 並以「美好的城市／自然」、「營造一個理想社會」、「言論自由」、「營造一個友善社會」、「有參與社區及工作決策的機會」、「參與政府決策的機會」等六項調查項目。在經濟繁榮與富裕安全之下, 民眾重視「安適」的價值, 即優先滿足自我表達、言論自由、知識、審美等高階需求者, 即是後物質主義者。

物質主義者重視物質安全、經濟安定等二項需求層級, 並以「強大的國防力量」、「防止犯罪」、「維持社會秩序」、「經濟穩定」、「經濟成長」、「防止物價上漲」等六項調查項目。在貧窮匱乏與缺乏安全之下, 民眾重視「生存」的價值, 即優先滿足生理需求與安全需求等低階需求者, 即是物質主義者。至於混合型主義者則介於物質主義者與後物質主義者之間。



圖二需求階層與價值指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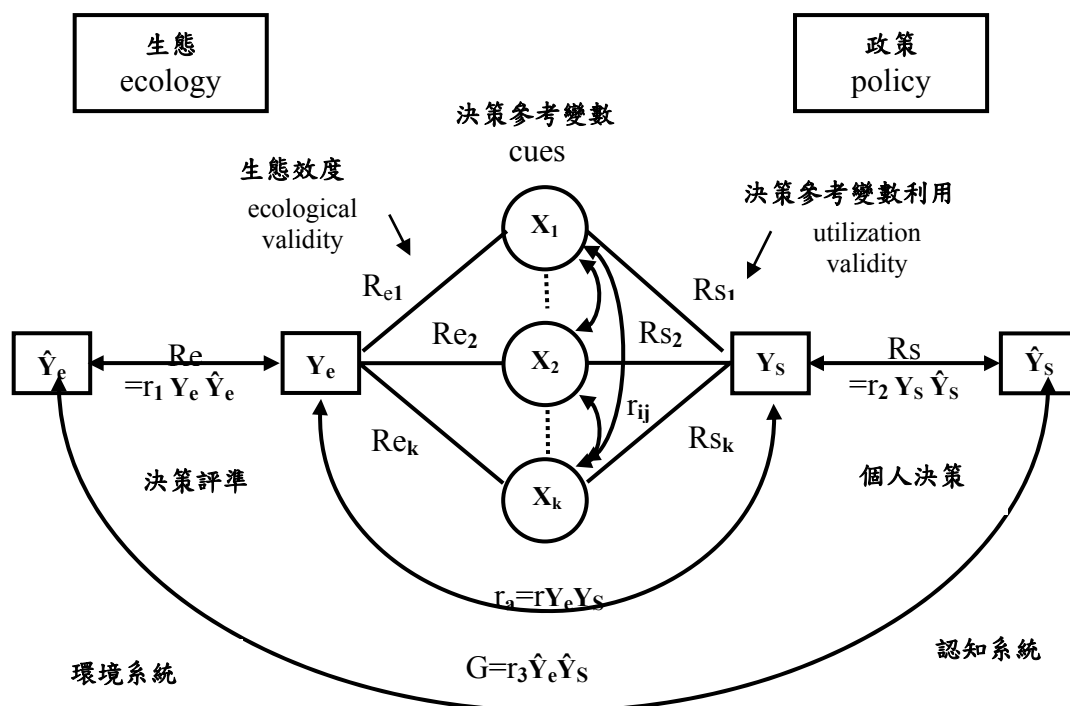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整理自 Inglehart (1977)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方法：社會判斷理論途徑

社會判斷理論是由 Hammond 等(1975a)根據 Brunswik(1952)的透鏡模式(lens model)所引申發展出來，旨在探討決策或判斷時涉及兩個系統，主要以決策參考變數(cue)作為認知系統和環境系統之間의共同介面，它是表面的，已被提供的、近的。

一是決策者的主觀認知系統，即決策者利用或透過已知決策參考變數作主觀判斷，即是個人決策；在系統中的決策參考變數利用是連結認知系統的個人決策與決策參考變數之間的相關。另一是為客觀存在的環境系統，即決策者利用或透過已知或確定決策參考變數作為深的、遠的與被用來推斷的客觀判斷，即是決策評準(criterion)；在系統中的生態效度是連結環境系統的決策評準與決策參考變數之間的相關，如圖三。



圖三 修正 Brunswik 標準透鏡模式示意圖

整理自 Arkes and Hammond(1986), Hammond (1955, 1975a, 1996), Cooksey and Freebody (1985:47), Cooksey (1995), 汪明生 (1989), 汪明生、林錦郎 (2003)

由於決策者是準理性的，認知能力有限，內在心智過程的不同，根據已知或確定的變數作決策或判斷時，產生主觀認知與客觀環境間之「認知不清」與「認知不同」的問題(汪明生，1989)，可藉由透鏡模式方程式(Lens Model Equation) (Hursch et. al., 1964 : Cooksey and Freebody, 1985)，以 $r_a = G * R_e * R_s + C * \text{SQRT}((1-R_e)^2(1-R_s)^2)$ 作說明。例如，民眾與政府防治人員的環境正義認知(陳文俊，2005；陳文俊等，2006)，或高雄市民眾對公平與關懷的道德認知議題(陳建寧等，2007b)，但價值觀課題尚未敘述。

r_a ($r_a = r * Y_e * Y_s$)，稱為決策表現(achievement)或是兩者間判斷一致性，在環境系統中的決策評準 (Y_e) 與認知系統中的個人決策(Y_s)間的線性相關係數，用以衡量決策者的決策或判斷品質。當環境系統中的客觀事實未知或無法衡量時， r_a 就成為決策者的主觀決策相似程度， r_a 愈高表示決策者間認知差異愈低，決策衝突也愈小，決策者的判斷品質將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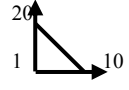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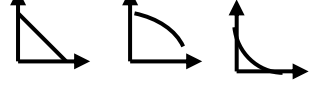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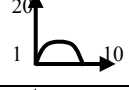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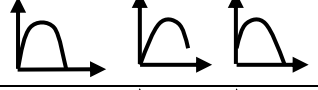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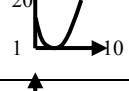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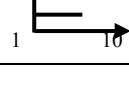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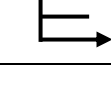
R_s ($R_s = r_2 Y_s \hat{Y}_s$)，稱為認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或稱為決策的一致性，代表認知系統中使用決策參考變數線性迴歸模式作預測或加以解釋之程度。認知一

致性愈高代表決策者愈能充分利用決策參考變數，且前後的決策具有一致性，為穩定而非隨機的決策方式。

$R_e(R_e = r_1 Y_e \hat{Y}_e)$ ，稱為決策問題的不確定性(task uncertainty)，代表環境系統中使用決策參考變數線性迴歸模式加以解釋之程度。決策資訊的確定性亦影響決策品質或主觀判斷的相似性，只有當客觀環境的資料有確定之組合原則或可被線性迴歸模式充分解釋時，呈現較好的決策品質或主觀判斷的相似性。

$C [C = r_4 (Y_e - \hat{Y}_e) * (Y_s - \hat{Y}_s)]$ ，稱為殘差項， Y_e 與 Y_s 的線性迴歸分析中所未包括非線性部份而來的殘差項相關，亦即 G 不能解釋的部份。但在一般的決策情況下非線性部份並不顯著，可忽略之 (Hursch et. al., 1964; Cooksey and Freebody, 1985; 汪明生, 1989; 林錦郎, 2001)。

$G (G = r_3 * \hat{Y}_e * \hat{Y}_s)$ ，稱為知識，是以決策參考變數為自變項，以決策評準為因變項的複迴歸模式所作統計推估的客觀事實與主觀判斷間的相關程度 (以 r_3 衡量)，代表兩個各別系統中，扣除實際判斷時的不一致後的主觀判斷與客觀事實間的相似性，亦即主觀決策模式與客觀資料組合模式間的相似性。當環境系統的資料組合模式未知時， G 即代表決策者間決策模式 (或判斷原則) 的相似性。此種相似性可用複迴歸模式中的貝它權重與決策評準及決策參考變數間的函數關係來說明，包括線性、非線性及變數間之正負函數關係，如圖四。

代表圖形	包含之各種圖形	政策意義
		正相關，愈多愈好 (the more, the better)。決策者認為以決策參考變數作判斷時，愈多對決策評準愈好。
		負相關，愈多愈差 (the more, the worse)。決策者認為以決策參考變數作判斷時，愈多對決策評準愈差。
		開口向下拋物線，適中最好 (the more, the better to a point then worse)。決策者認為以決策參考變數作判斷時，適中對決策評準愈好。
		開口向上拋物線，適中最差 (the more, the worse to a point then better)。決策者認為以決策參考變數作判斷時，適中對決策評準愈差。
		水平直線，無相關。決策者認為以決策參考變數作判斷時，則與決策評準無相關。

圖四函數圖形型態

註：縱軸為決策者（北高兩市公民）之評估的分數；橫軸為決策參考變數隨機組合衡量指標

（一）判斷分析架構

「經濟自由」、「社會多元」與「政治民主」是現代性公共領域的基本的要素，也成為總體社會系統的基礎。個人在現代公共領域中是最基本的分析單位，探討北高兩市外顯的社會現象，須在維護「私」領域與私利益前提下，建立群體互動「公」的意識與「公益」認知，因而由「個體角色」與「個體認知」構成「個體分析」是反映南北差異心理基礎，從判斷分析觀點切入，更能掌握北高兩市「南北差距」的社會全盤架構。

判斷是我們日常生活經常面臨的基本認知活動（Slovic and Lichtenstein, 1971），個體對於所投入的既有資訊，經由心理或智識性的過程而得到解決方案與推論。判斷分析是在探討決策者（個體）對決策標的或評準，作價值判斷的心理認知過程，屬於事後分析（「結果」發生之後）。在操作上，由「結果」中客觀衡量選取「屬性」，先由專家對「屬性」及「目標」作事實判斷而構成客觀評估準則，再由決策者依據其主觀價值體系對「目標」與「標的」作價值判斷，以及對「標的」與「情勢」作人際判斷，如圖五。在理論上，以「社會判斷理論」具代表性，方法上採用迴歸分析。

（二）價值觀操作指標與衡量

價值觀是一種基本信念，具有引導個體行為、幫助個體作決策、解決衝突與激勵個人達成自我實現等功能（翁淑緣，1995），或是個體對事務、行為或標的的持久性偏好或判斷的標準，具有主觀認知、情感與意向的判斷，影響個體何事該做與不該做之行為、滿足個體各層次需求，達成某種行為模式或事物的最終狀態（吳鐵雄等，1996），國內進行研究民眾的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通常以 Inglehart（1977）與瞿海源（1993）價值觀指標為主，採用一般問卷方式衡量（周聖平，2001；汪明生、林錦郎，2000，汪明生、陳碧珍等，2001）。

1 決策參考變數選取

社會判斷理論的重點是描述結合決策者的權重與資訊線索而形成判斷，確認線索或判斷分析、「判斷原則捕捉」（policy capturing）是決策原則與分析的主要部份，也是典型的 SJT 分析的主要步驟，（Stewart, 1988；Hammond and Joyce, 1975b），Doyle 與 Thomas（1995）說明判斷原則的技術，強調以 Brunswikian 的「代表性設計」（representative design）更要接近模擬真實世界的實驗性案例。

本研究採取價值觀操作指標是參考需求層級理論（Maslow, 1954），文化移

轉（價值變遷）理論（Inglehart, 1977），第二期第四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瞿海源，1993），選取言論自由、社會認同、發展效率、社會安定、收入增加等 5 項指標作為「價值觀」之決策參考變數，結合判斷分析構成研究架構，並由北高兩市公民對環境系統中 25 種案例的價值觀作判斷，如圖五。

2. 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的指標

由圖五所示，價值觀議題涉及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以判斷分析觀點，說明「結果」、「屬性」、「目標」、「標的」與「情勢」之間的意義，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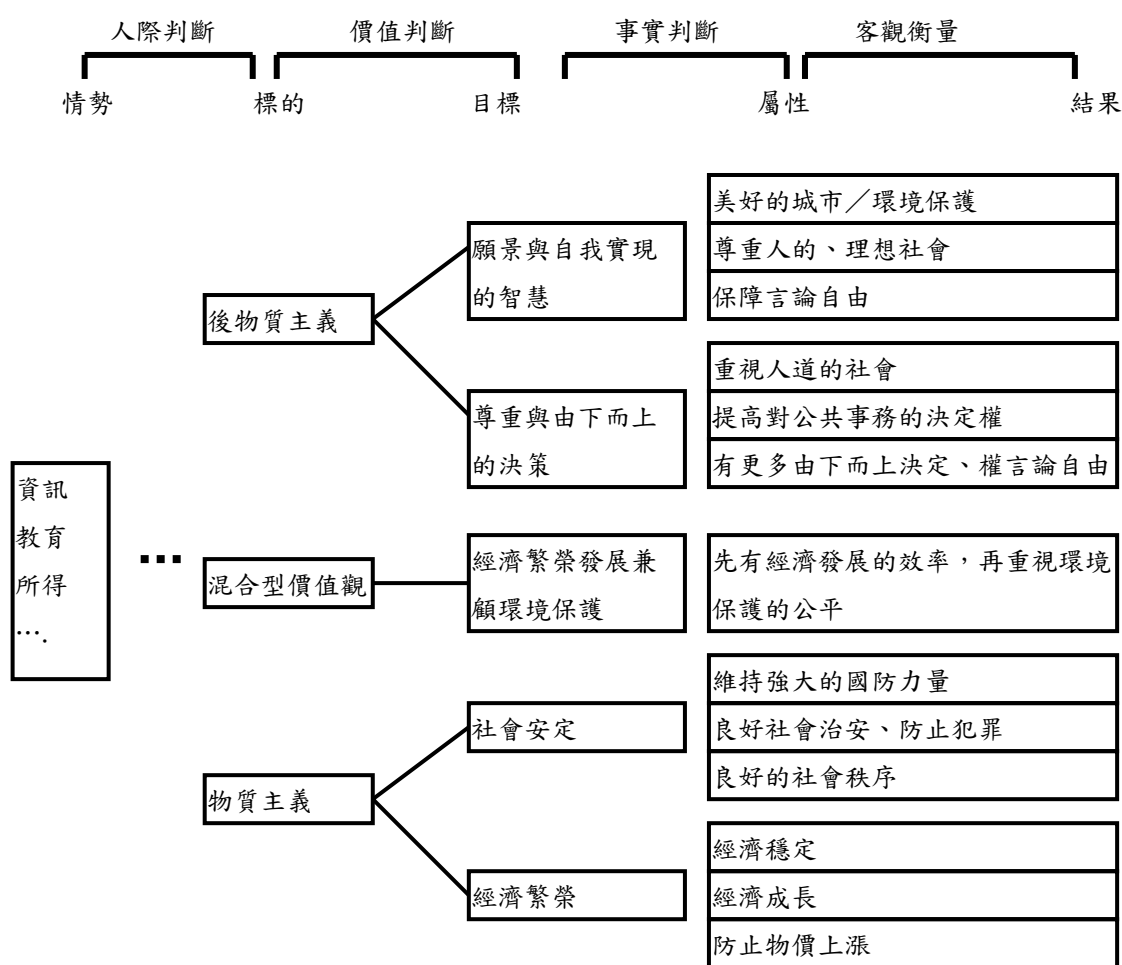
後物質主義者是在經濟繁榮與富裕安全之下，重視「安適」的價值，在尊嚴與自我實現需求層級階段，尋求自我尊重、他人尊重、自我改進與自我策勵的需求層級的「結果」，經由客觀衡量選出包括美好的城市／環境保護，尊重人的、理想社會，保障言論自由，重視人道的社會，提高對公共事務的決定權，有更多由下而上決定、權言論自由等「屬性」，藉由專家學者或模式推論操作構成願景與自我實現的智慧（ X_1 ）與尊重與由下而上的決策（ X_2 ）的事實判斷，北高兩市公民依據本身的主觀價值體系對願景與自我實現的智慧（ X_1 ）與尊重與由下而上的決策（ X_2 ）「目標」與後物質主義「標的」作價值判斷，以及對後物質主義「標的」與資訊、教育與所得情境「情勢」作人際判斷。

混合型價值觀是在穩定經濟繁榮發展兼顧環境保護之下，重視「發展效率」的價值，在愛的需求層級階段，既屬團體，又要為人所接受的「結果」，經由客觀衡量選出先有經濟發展的效率，再重視環境保護的公平之「屬性」，藉由專家學者或模式推論操作構成發展效率兼顧環境保護（ X_3 ）的事實判斷，北高兩市公民依據本身的主觀價值體系對發展效率兼顧環境保護（ X_3 ）「目標」與混合型價值觀「標的」作價值判斷，以及對混合型價值觀「標的」與資訊、教育與所得情境「情勢」作人際判斷。

物質主義者是在貧窮匱乏與缺乏安全之下，重視「生存」的價值，在生理與安全需求層級階段，從維持個體生存所需各種資源、免於焦慮、恐懼，使自己覺得安全、安定的「結果」，經由客觀衡量選出包括維持強大的國防力量，良好社會治安、防止犯罪，良好的社會秩序，經濟穩定，經濟成長，防止物價上漲等「屬性」，藉由專家學者或模式推論操作構成社會安定（ X_4 ）、經濟繁榮（ X_5 ）的事實判斷，北高兩市公民依據本身的主觀價值體系對社會安定（ X_4 ）、經濟繁榮（ X_5 ）「目標」與物質主義「標的」作價值判斷，以及對物質主義「標的」與資訊、教

育與所得情境「情勢」作人際判斷。

決策參考變數相關性的高低，經由認知回饋將影響決策者的實際判斷結果，認知回饋係指由 Policy PC^{3th} (1993) 所作迴歸分析歸納的實際判斷原則，揭露給決策者下一回合作價值判斷之參考 (林錦郎，2005)。因此，決策參考變數相關性高，在進行兩回合準實驗時，因產生共線性 (collinearity) 而造成因果邏輯的繆誤。本研究選取 5 個決策參考變數具有物質與精神對立意涵，呈現相關性極低或無相關，並由 Policy PC^{3th} 隨機選取 25 種假設日常生活價值觀狀況案例，而且進行一次的一般問卷訪談蒐集資料，研究結果能反應決策者的真實判斷結果。



圖五價值觀的認知判斷架構

資料來源：整理自 Inglehart (1977)，瞿海源 (1993)

(三) 研究訪問範圍與母群界定

本研究係以設籍台北市、高雄市為訪問地區，年滿 20~69 歲的民眾作為受測者。台北市年滿 20~69 歲的民眾為 1,797,722 人，高雄市年滿 20~69 歲的民眾為 1,054,232 人（整理自 94 年底內政部台閩地區各縣市人口數按性別及五歲年齡組分），作為進行研究的母群，探討北高兩市民眾在日常生活上表現出的價值觀。

價值觀 SJT 問卷係屬社會實驗類型(social experimentation) (Dunn, 2004)，它是一種監測政策結果的途徑，將自然科學家在實驗室所採用實驗方法應用到公共事務上，藉以監測公共政策對社會現狀衝擊狀況。

(四) 抽樣方式與樣本

由於「社會」是公共政策的實驗場地，以「人」為實驗對象，極為不易控制變項的情境因素。針對台北市年滿 20~69 歲的民眾計 1,797,722 人，高雄市年滿 20~69 歲的民眾計 1,054,232 人，抽選出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樣本作為調查的對象。依據大拇數法則 (thumb rule)，在 $n*(1-p)$ 必須大於等於 10 時 (n =樣本數， p =機率)，才能足以推論母群的意見。假設 $n=1,068$ ， $p=0.5$ ，所以 $1,068 * (1 - 0.5) = 534$ 大於 10。因此，在 95% 的信心水準下，誤差不超 3%，取樣人數為 1,068 人的意見，就可推論全體母群的意見。以卡方適合度檢定(Goodness of fit test) 檢定樣本問卷實際觀察次數分配與各行政區實際母體的分配樣本是否具有代表性。

本研究抽樣方式採取分層隨機抽樣法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先將母群作行政區進行分層，再依據台北市、高雄市的人口密度比 (www.ris.gov.tw 2006/09/21)，訂出人口密度一定比例，從戶籍資料進行隨機抽取 1,068 位人數，所取出之樣本在結構上與母群結構一致，確保抽樣具有母群之代表性。並由各行政區訪員以面對面台北市 12 個與高雄市 11 個行政區民眾進行問卷調查與資料蒐集，預計各完成 1,068 份。

(五) 資料蒐集方式與研究限制

在發放問卷之前，於 2006 年 10 月 5 日先行安排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班與博士班學生計 20 位作預測(pilot test)，初步練習反應問卷內容與判斷熟悉度，修飾價值觀的意義及解釋操作衡量變項指標後完成正式問卷，以減少判斷反應值之變異。

正式研究係從 2006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06 年 12 月 10 日止，由北高兩市各行政地區訪員面對民眾以系統抽樣方法，以面對面方式向受測者說明、訓練，使

其熟悉 SJT 問卷判斷來蒐集資料，避免時間效果對研究可能產生的影響。

本研究係屬社會科學研究，它的成果是認識結果的價值，反映對象真實狀況與客觀的規律，排除個體偏見而反映獲得群體的普遍態度的價值判斷，這不是滿足研究者個體的需要，而是滿足受測者所在群體的需要（卜衛等，2005），嚴格來說 1,068 受測者雖未必具有北高兩市民意的代表性，但研究結果在於反應受測者所在價值觀之情況。

肆、調查結果與資料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係以年滿 20-69 歲設籍在北高兩市民眾的價值觀為主軸，比較北高兩市民眾的價值觀一致性、相對權重、函數型態等，作完善的資料蒐集，以反映真實的北高兩市社會結構情況，資料分述如下：

（一）北高兩市基本資料

台北市各行政區訪員以面對面方式對受測者發放問卷來蒐集資料，發 1,068 份，回收 871 份，回收率 81.6%，其中 126 份遺漏資料，有 745 份採用 SPSS 與 Policy PC^{3th} 作統計分析，其中 214 份 $R^2 < 0.5$ ，不予列入分析，有效問卷計 531 份，有效率為 60.9%。並經卡方適合度檢定樣本問卷實際觀察次數分配與各行政區所在實際母體的次數分配，在 $d=1$ ， $\alpha=0.05$ 水準並無差異（ $\chi^2=2.055 < 0.05(1)=3.845$ ），本研究樣本具有代表性。

從台北市受測者基本資料（如表 1 所示）來看，男性比例為 53.5%，女性比例為 46.5%；年齡分布在 30 至 49 歲居多（68.4%）；教育程度以大學、研究所居多（68.4%）；職業分布學生（7.9%）、軍公教（10.5%）、工商業（26.3%）、服務業（30.7%）、自由業（21.1%）、家庭主婦（3.5%）；收入分布在 30,001 至 70,000 元居多（72%）。

高雄市各行政區訪員以面對面方式對受測者發放問卷來蒐集資料，發 1,068 份，回收 894 份，回收率 83.7%，其中 116 份遺漏資料，有 778 份採用 SPSS 與 Policy PC^{3th} 作統計分析，其中 210 份 $R^2 < 0.5$ ，不予列入分析，有效問卷計 568 份，有效率為 63.5%。並經卡方適合度檢定樣本問卷實際觀察次數分配與各行政區所在實際母體的次數分配，在 $d=1$ ， $\alpha=0.05$ 水準並無差異（ $\chi^2=2.138 < 0.05$

(1) = 3.845)，本研究樣本具有代表性。

從高雄市受測者基本資料（如表 1 所示）來看，男性比例為 55.5%，女性比例為 44.5%；年齡分布在 30 至 49 歲居多（59.5%）；教育程度以專科、大學居多（72.6%）；職業分布學生（11.5%）、軍公教（14.0%）、工商業（27.0%）、服務業（20.5%）、自由業（20.0%）、農林漁牧（2.5%）、家庭主婦（4.5%）；收入分布在 30,001 至 70,000 元居多（46.0%）。

台北市受測者在日常生活上表現的公民文化，有 48.2%（高於高雄市 42%）同意在未被他人發現犯錯時就立即受到處罰或責備，但有 43%（高於高雄市 40.5%）不同意立即受到處罰或責備；有 59.7%（低於高雄市 65.5%）選擇重視公共利益，但有 31.6%（高於高雄市 24.0%）選擇重視私人利益；有 54.4%（低於高雄市 63.5%）選擇重視保護環境品質，但有 41.3%（高於高雄市 29.0%）選擇重視所得收入增加；在社交活動上有 85.9%（高於高雄市 60.6%）對於別人選擇重視信任，有 14% 選擇重視關係（低於高雄市 33.9%）；雖有 63.2%（高於高雄市 53%）同意「915」新公民運動，但 14.9%（低於高雄市 21%）表示無意見；同樣地，有 62.3%（高於高雄市 41.5%）不同意「916」護台灣活動，也有 21.1%（低於高雄市 29%）表示無意。

從基本資料顯示台北市民眾具有自主意識、比較多元與有更多反覆推敲的理性思考，強調理性並以履行義務和責任，互相尊重、相信分配正義處理公共事務問題，相對地，高雄市民眾具有豪爽、熱情鄉土草莽的性格，較少自主意識、缺少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對於不同的訊息來源偏愛廣播、口耳相傳，容易接收快速的傳播，也對於公共議題或科技生活型態比較冷漠。

表 1 北高兩市基本資料描述性統計

類別	項目	台北市		高雄市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284	53.5	315	55.5
	女性	247	46.5	253	44.5
年齡	20-29 歲	107	20.2	139	24.5
	30-39 歲	205	38.6	176	31.0
	40-49 歲	158	29.8	162	28.5
	50-59 歲	51	9.6	80	14.0
	60 歲以上	10	1.8	11	2.0
居地	台北市	534	100	0	0
	高雄市	0	0	568	100
教育程度	國中小	5	0.9	11	2.0
	高中職	47	8.8	60	10.5
	專科	116	21.9	137	24.0
	大學	242	45.6	276	48.6
	研究所（以上）	121	22.8	84	14.9
職業	學生	42	7.9	65	11.5
	軍公教	56	10.5	80	14.0
	工商業	139	26.3	153	27.0
	農林漁牧	0	0	14	2.5
	服務業	163	30.7	116	20.5
	自由業	112	21.1	114	20
	家庭主婦	19	3.5	26	4.5
收入	30,000 元以下	88	16.7	185	32.5
	30,001~50,000 元	214	40.4	147	26.0
	50,001~70,000 元	167	31.6	114	20.0
	70,001~90,000 元	33	6.1	105	18.5
	90,001 元以上	29	5.3	17	3.0
責備	非常同意	19	3.5	45	8.0
	同意	238	44.7	194	34.0
	非常不同意	42	7.9	54	9.5
	不同意	186	35.1	176	31.0
	無意見	46	8.8	99	17.5
公益 vs 私利	比較重視公益	167	31.6	207	36.5
	重視公益	149	28.1	165	29.0
	比較重視私利	14	26.3	114	20.0
	重視私利	28	5.3	23	4.0
	無意見	47	8.8	59	10.5
環保 vs 所得	比較重視環保	144	27.2	224	39.5
	重視環保	144	27.2	136	24.0
	比較重視所得	172	32.5	102	18.0
	重視所得	47	8.8	63	11.0
	無意見	24	4.4	43	7.5
信任 vs 關係	比較重視信任	237	44.7	188	33.1
	重視信任	219	41.2	156	27.5
	比較重視關係	60	10.5	114	20.0
	重視關係	18	3.5	79	13.9
	無意見	0	0	31	5.5
915	非常同意	107	20.2	99	17.5

新 公 民 運 動	同意	228	43.0	202	35.5
	非常不同意	46	8.8	59	10.5
	不同意	71	13.2	89	15.5
	無意見	79	14.9	119	21
916 愛 台 灣	非常同意	14	2.6	68	12.0
	同意	75	14.0	128	22.5
	非常不同意	201	37.7	105	18.5
	不同意	130	24.6	102	18.0
	無意見	111	21.1	165	29.0

二、北高兩市民眾對價值觀判斷的認知一致性

本研究採用雙系統透鏡模式的問卷設計，在認知系統中有北高兩市民眾兩個決策者，而在環境系統（ R_e ）中價值觀為因變數，衡量價值觀方程式為 $ra = G^* R_{s1}^* R_{s2}$ 。在透鏡方程式中認知控制（ R_s ）、決策表現（ ra ）與判斷原則相似性（ G ）等三項指標，藉由 Policy PC^{3th} 統計參數加以衡量。

由 Policy PC^{3th} 計算複迴歸模式的相關係數平方為判定係數（ R^2 ），即可推估北高兩市民眾對價值觀判斷本身的認知一致性（ R_s ）。 R^2 愈大即認知一致性愈高，表示民眾愈能充分利用言論自由（ X_1 ）、社會認同（ X_2 ）、發展效率（ X_3 ）、社會安定（ X_4 ）與收入增加（ X_5 ）等決策參考變數資訊且前後對價值觀認知判斷具有一致性，為穩定而非隨機的決策方式。

相關係數是兩個變數之間的相關程度大小，在 0.70~0.99 之間為高度相關，由表 2 所示，台北市民眾的相關係數為 $R=0.909$ ，認知一致性為 $R^2=0.826$ ，調整 $R^2=0.701$ ，迴歸方程式 $Y=7.930-0.184 X_1-0.076 X_2+0.003 X_3+0.466X_4+0.382X_5$ ；高雄市民眾的相關係數為 $R=0.916$ ，認知一致性為 $R^2=0.838$ ，調整 $R^2=0.722$ ，迴歸方程式 $Y=7.535-0.108 X_1+0.052 X_2+0.021 X_3+0.522 X_4+0.294 X_5$ 。

北高兩市民眾的相關係數分為 $R=0.908$ 與 $R=0.916$ ，顯示北高兩市民眾利用言論自由、社會認同、發展效率、社會安定與收入增加等解釋價值觀程度之間高度相關。判定係數（ R^2 ）愈高代表自變數越能解釋依變數，表示北高兩市民眾利用言論自由、社會認同、發展效率、社會安定與收入增加等解釋價值觀程度，台北市民眾的認知一致性為 $R^2=0.826$ ；高雄市民眾的認知一致性為 $R^2=0.838$ ，顯示高雄市民眾解釋價值觀程度高於台北市民眾。

表 2 北高兩市民眾對價值觀判斷的認知一致性

決策參考變數	常數	β	台北市民眾	常數	β	高雄市民眾
	7.930			7.535		
言論自由 (X_1)		-0.184	-0.583		-0.108	-0.522
社會認同 (X_2)		-0.076	-0.260		0.052	-0.130
發展效率 (X_3)		0.003	0.006		0.021	0.003
社會安定 (X_4)		0.466	0.583		0.522	0.714
收入增加 (X_5)		0.382	0.405		0.294	0.250
標準差			2.10			1.84
R			0.909			0.916
R ²			0.826			0.838
調整 R ²			0.701			0.722

三、北高兩市民眾對價值觀判斷的實際與推估判斷值一致性

從 Policy PC^{3th} 推估北高兩市民眾作價值觀判斷時的實際與推估判斷值一致性，即可衡量民眾的決策表現 (ra) 或兩者間判斷一致性，亦即衡量北高兩市民眾對後物質主義、混合型主義與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認知程度。

價值觀認知的實際與推估判斷值一致性，表示在相同的決策參考變數客觀條件下，北高兩市民眾對價值觀認知有一致性判斷。由表 3 所示，北高兩市民眾的實際判斷值一致性為 $R^2=0.9025$ ，並由 Policy PC^{3th} 推估北高兩市民眾推估判斷值一致性為 $R^2=0.9025$ ，實際判斷一致性與推估判斷值一致性愈接近，表示決策表現愈好。

表 3 北高兩市民眾對價值觀判斷的實際與推估判斷值一致性

實際判斷		推估判斷	
台北市民眾	高雄市民眾	台北市民眾	高雄市民眾
1.00	0.95	0.91	0.87
0.95	1.00	0.87	0.92
0.91	0.87	1.00	0.95
0.87	0.92	0.95	1.00

四、北高兩市民眾對價值觀的相對權重與函數型態

(一) 相對權重

由 Policy PC^{3th} 針對北高兩市民眾對價值觀的判斷值，利用複迴歸分析統計推估決策參考變數的相對權重，即「言論自由、社會認同、發展效率、社會安定與收入增加」等決策參考變數在北高兩市民眾心中的重要性程度。呈現北高市民

眾對價值觀的優先性依序分為：社會安定(39%與 44%)、收入增加(26%與 28%)、言論自由(17%與 12%)、社會認同(15%與 9%)與發展效率(3%與 7%)等相對權重累積為 100%。

依北高兩市土地與氣候的自然條件，以及 1.環境清潔、2.住宅狀況、3.醫療保健、4.運輸通訊、5.公共安全、6.政府服務、7.基礎資料、8.家庭生活、9.教育文化、10.勞動就業等 10 大類為評比指標 (www.dbas.taipei.gov.tw，2005/12/20) (www.kcg.gov.tw，2005/12/20) 作為論述價值觀優先性之參考，分述如下：

1.社會安定在北高兩市民眾心中為最優先性，強調良好社會治安、防止犯罪。在公共安全上，高雄市平均每萬人警察人數低於台北市為 23.31 人，每十萬人刑案發生件數卻高於台北市為 2,601 件，又逢「倒扁反貪污」運動進入南部縣市，以及北高兩市市議員選舉形成藍綠意識形態的對立，高雄市民眾反應社會安定的優先性(44%)高於台北市民眾(39%)。

2.收入增加在北高兩市民眾心中為第二優先性，強調經濟繁榮穩定、所得收入增加。在基礎資料、家庭生活與勞動就業上，高雄市每人每年可支配所得低於台北市民眾為 286,949 元，但貧富差距倍數卻高於台北市為 6.00 倍，失業率也高於台北市為 5.5%；在政府服務與教育文化上，高雄市每一民眾享有社會福利支出低於台北市為 4,325 元，高雄市民眾反應收入增加的優先性(28%)高於台北市民眾(26%)。

3.言論自由與社會認同在北高兩市民眾心中為第三、四優先性，強調尊重人的、理想社會，以及由下而上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機會。台北市受大學教育程度占總人口比率高於高雄市為 47.69%，服務業高於高雄市為 80.5%，台北市中產階級人口比率高於高雄市為 35.16%，相對地，高雄市勞工階級人口比率高於台北市為 14.16%，以致台北市民眾反應言論自由的優先性(17%)高於高雄市(12%)，以及社會認同的優先性(15%)高於高雄市(9%)。

4.發展效率在北高兩市民眾心中為最後，強調經濟發展效率與環境保護。高雄市都會區以其擁有的自然資源條件，並配合當地產業政策規劃，以鋼鐵、造船、石化、機械等製造業為根據地，被定位為「工業化城市」，有「台灣工廠」之稱。在環境清潔上，高雄市在污水處理率低於台北市為 45.18%，在空氣二氧化硫含量上高於台北市為 0.009ppm，高雄市民眾反應發展效率的優先性(7%)高於台北市(3%)。

（二）函數型態

由 Policy PC^{3th} 推估北高兩市民眾作決策判斷的判斷值，各決策參考變數與價值觀間函數型態關係，比較北高兩市民眾間函數型態，言論自由呈現負相關，社會認同與發展效率呈現適中最好，社會安定與收入增加呈現正相關之情形，顯示民眾偏好狀況及其意義，如表 4，G 是代表認知系統中北高兩市民眾的判斷原則相似性，經由 Pearson 相關計算 $G=.950$ ，顯示對決策評準的相關性高。函數型態的意義分述如下：

1. 言論自由

（1）愈多愈差，呈現負相關。

（2）北高兩市民眾認為以言論自由作為決策參考變數，進行價值觀評準，對於後物質主義的評準愈多愈差，呈現負相關，台北市曲線在高雄市曲線之上。

言論自由是後物質主義指標之一，強調尊重人的、理想社會，個體藉由體制與倫理連結，基於深思熟慮的知識以及具有社會性的道德倫理而產生支持或反對公共政策資訊的動機理由，並且經由體制保障與制約的公共論壇公開表達陳述支持或反對政策理由，以及承諾監督檢驗政策主張事後結果成效，成為民主社會所必需的基本技術。言論自由透過「公共論壇」方式，討論「規則」體制的報償與處罰，經由個體的道德自律與群體的倫理他律，促使個體學習人際學習規則、共享互惠與值得信任的規範，以增進制定公共議題情況的運作。但北高兩市民眾認為以言論自由對於後物質主義的評準愈多愈差，呈現負相關，台北市曲線在高雄市曲線之上，反應公共論壇體制未臻健全。

2. 社會認同

（1）開口向下拋物線，適中最好。

（2）北高兩市民眾認為以社會認同作為決策參考變數，進行價值觀評準，適中對於後物質主義的評準最好。

社會認同是後物質主義指標之一，主要是由下而上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機會，公民社會是正常的民主社會基石（謝世民，2003），台北市民眾具有自主意識、比較多元與有更多反覆推敲的理性思考，強調理性並以履行義務和責任，互相尊重、相信分配正義處理公共事務問題，相對地，高雄市民眾具有豪爽、熱情鄉土草莽的性格，較少自主意識、缺少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對於不同的訊息來源偏愛廣播、口耳相傳，容易接收快速的傳播，也對於公共議題或科技生活型態

比較冷漠。北高兩市民眾認為以社會認同對於後物質主義的評準最好，但基於邊際效用遞減律，在達到某一程度水準時（6）之前，台北市曲線在高雄市曲線之上；在達到某一程度水準時（6）之後，台北市曲線在高雄市曲線之下。

3.發展效率

（1）開口向下拋物線，適中最好。

（2）北高兩市民眾認為以發展效率作為決策參考變數，進行價值觀評準，適中對混合型價值觀的評準最好。

發展效率是混合型主義指標，強調經濟發展效率與環境保護，台北市為政治的首善之區，長期享有資源分配的優先性，都市聚集效應帶來工商繁榮與人文薈萃，國際化與資訊化使台北都會呈現精緻發展的走向。相對地，高雄市都會區以其擁有的自然資源條件，並配合政府產業政策規劃，作為鋼鐵、造船、石化、機械等製造業根據地，被定位為「工業化城市」，有「台灣工廠」之稱。北高兩市民眾認為以發展效率對混合型價值觀的評準適中最好，明顯呈現高雄市曲線。

4.社會安定

（1）正相關，愈多愈好。

（2）北高兩市民眾認為以社會安定作為決策參考變數，進行價值觀評準，愈多對物質主義的評準愈好。

社會安定是物質主義指標之一，強調良好社會治安、防止犯罪。在公共安全上，高雄市平均每萬人警察人數低於台北市為 23.31 人，每十萬人刑案發生件數卻高於台北市為 2,601 件，而倒扁和挺扁文化被人為刻意操縱為北部中產階級群眾仗恃著文化及經濟的優越感，欺壓南部農工階級民眾，輕忽法治和道德在公民社會的養成過程（聯合報，2006/09/25，A2 版）。這種對立政治意識形態與社會階層的衝突，北高兩市民眾認為以社會安定對物質主義的評準愈多愈好，台北市曲線在高雄市曲線之上。

5.收入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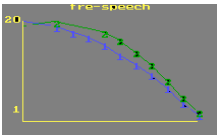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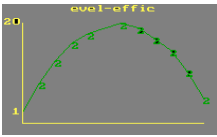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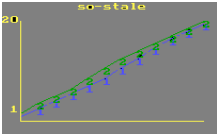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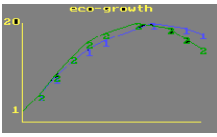
（1）正相關，愈多愈好。

（2）北高兩市民眾認為以收入增加作為決策參考變數，進行價值觀評準，愈多對物質主義的評準愈好。

收入增加是物質主義指標之一，經濟繁榮穩定、所得收入增加，台北市因都市聚集效應帶來工商繁榮與人文薈萃，服務業在整體產業結構上占 80.5%，每人

每年可支配所得高於高雄市為 392,385 元。相對地，高雄市被規劃為鋼鐵、造船、石化、機械等製造業根據地，長期以來產業結構以初級與次級產業為主，服務業也明顯低於台北市只占 68.98%，每人每年可支配所得低於台北市為 286,949 元。但基於邊際效用遞減律，在達到某一程度水準時（7.5）之前，台北市曲線在高雄市曲線之上；在達到某一程度水準時（7.5）之後，台北市曲線在高雄市曲線之下。

表 4 北高兩市民眾對價值觀的相對權重與函數型態之比較

價值觀 決策參考變數	相對權重		函數圖形	意義
	台北市	高雄市		
言論自由	17	12		1 愈多愈差，呈現負相關。 2 北高兩市民眾認為以言論自由作為決策參考變數，進行價值觀評準，對於後物質主義的評準愈多愈差，呈現負相關，台北市曲線在高雄市曲線之上。
社會認同	15	9		1 開口向下拋物線，適中最好。 2 北高兩市民眾認為以社會認同作為決策參考變數，進行價值觀評準，適中對於後物質主義的評準最好，在達到某一程度水準時（6）之前，台北市曲線在高雄市曲線之上；在達到某一程度水準時（6）之後，台北市曲線在高雄市曲線之下。
發展效率	3	7		1 開口向下拋物線，適中最好。 2 北高兩市民眾認為以發展效率作為決策參考變數，進行價值觀評準，適中對混合型價值觀的評準最好，明顯呈現高雄市曲線。
社會安定	39	44		1 正相關，愈多愈好。 2 北高兩市民眾認為以社會安定作為決策參考變數，進行價值觀評準，愈多對物質主義的評準愈好，台北市曲線在高雄市曲線之上。
收入增加	26	28		1 正相關，愈多愈好。 2 北高兩市民眾認為以收入增加作為決策參考變數，進行價值觀評準，愈多對物質主義的評準愈好，在達到某一程度水準時（7.5）之前，台北市曲線在高雄市曲線之上；在達到某一程度水準時（7.5）之後，台北市曲線在高雄市曲線之下。

註：縱軸為決策者（北高兩市民眾）之評估的分數，橫軸為決策參考變數隨機組合的衡量指標。

1 表示台北市，2 表示高雄市。

伍、結 論

「南北差距」現象係來自北高兩市民眾個體認知差異，呈現在社會的人際、族群、團體乃至種族之間的衝突、矛盾。人類對於自然界的認識是從經驗客體的現象上，去尋找背後的本體，從而反映認識自己的起點與基礎，達到認識自然界本質規律性的目標，這是亞理斯多德的本體論重點之所在（周昌忠，1995），因此，發掘藏於南北差距行為現象下的個體價值觀，不但呼應當前社會重建價值體系急迫性，更能精確探討「南北差距」問題癥結之所在。

一、研究貢獻

人們在日常生活運作中，常常考量多個相關屬性資訊，依本身價值體系直覺認知對於日常公、私事務作價值判斷，成為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現象。個人的價值觀傾向，將影響與他人的社會互動，更影響社會結構發展方向，本研究從判斷分析觀點，與一般研究南北差距調查方式不同，首次應用社會判斷理論驗證北高兩市民眾的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等多元因素資訊，建立衡量價值觀的客觀標準，可提供國內未來研究實證架構的基礎。

二、研究發現

本研究發現北高兩市民眾對「言論自由、社會認同、發展效率、社會安定與收入增加」等決策參考變數，進行價值觀認知評準，呈現言論自由呈現負相關，社會認同與發展效率呈現適中最好，社會安定與收入增加呈現正相關之情形。由研究分析發現北高兩市民眾心中的重要性程度呈現後物質主義（32%與 21%）、物質主義（65%與 72%）、混合型（3%與 7%）。

從個體的本體來認識台北市社會結構，台北市民眾呈現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傾向（32%）高於高雄市民眾（21%），顯示經濟繁榮有助於後物質主義價值（Inglehart,1990），也與瞿海源（1993）調查北部地區民眾的後物質主義高於南部區域民眾相同。相對地，高雄市民眾呈現物質主義價值觀傾向（72%）高於台北市民眾（65%），顯示高雄市的服務業結構、個人可支配所得也低於台北市民眾。

從「兩岸四地城市競爭力」調查分析台北市第 1 名為「領先城市」；高雄市第 11 名為「優勢城市」（倪鵬飛，2006），或是從「幸福縣市調查」調查分析第 1 名為台北市；第 9 名為高雄市（天下雜誌，2006/08/30），反映本研究認為目前

高雄市的社會在現代社會結構中保有傳統社會之物質主義現象；相對地，台北市具有現代社會提升到後現代社會之後物質主義傾向，也是呈現「南北差距」價值觀現象之原因。

三、研究建議

研究發現北高兩市民眾的價值觀之心理認知程度優先性，以及台北市在中產階級人口比率為 35.16% 高於高雄市的 28.60%，相對於，高雄市勞工階級人口比率為 14.16% 高於台北市的 8.37%，可從代表南北社會文化價值觀變遷、社會人口和經濟產業等因素，解釋「北藍南綠」的政治現象，成為南北差距問題關鍵之所在（陳建寧，2007a）。從公共事務管理整合參考架構觀點，藉由經濟發展與提升公共事務管理教育將有助於社會移轉考驗，化解群體外顯的南北差距問題現象（汪明生，2005）。

在經濟政策上，對內發展是以經濟手段的地區行銷，吸引中產白領人口，改變社會人口結構，促進北高互補，在地培養提升個體的道德倫理價值。對外開放則以兩岸直航（聯合報，2006/01/16/，A4 版），藉由經貿文教交流，吸引既有白領中產人口，強調功能分工立足點的真公平，解決族群階級對立，才能通過由傳統到現代社會結構的移轉考驗。

從教育塑造培養關心、追求公共利益的「公民」，學校在公共事務管理教育課程上，培養民眾公民意識、理性思辯、批判多元觀點為目標；在「公民與社會」課程或道德教育上，培養民眾價值觀、邏輯思考、辨別是非、重視利他與嚴守正義，重視個體與群體相對權利義務互動關係，透過公共論壇方式啟發高雄市民眾重視體制、承諾與監督地方公共事務發展之公民社會。

總結來說，北高兩市在台灣近 50 年的經濟發展之下，導致文化變遷與社會結構轉型，民眾在社會生活上係以「資訊傳播、知識教育與道德倫理」等本質進行各種社會互動，呈現出複雜與多樣的價值傾向，尤以個體的「價值觀」將影響傳統到現代，由現代到後現代的轉型。從本研究建構價值觀指標去發掘南北差距行為現象，提供探討「南北差距」問題癥結之參考方向。

參考文獻

- 卜衛、周海宏、劉曉紅 (2005)。社會科學成果價值評估。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王甫昌 (1994a)。「光復後台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6:43-96。
- 王甫昌 (1994b)。「族群同化與動員：台灣民眾政黨支持之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7:1-34。
- 王甫昌 (1998)。「族群意識、民族主義與政黨支持：一九九〇年代台灣的族群政治」，**台灣社會學研究**，第 2 期，頁 1-45。
- 王叢桂 (1993)。「三個世代大學畢業工作者的價值觀」，**本土心理學研究**，第二期，頁 206-250。
- 王叢桂 (2002)。「影響工作價值觀傳遞之因素：男性中小企業主及一般職業工作者子女之比較」，**應用心理研究**，第 14 期，頁 117-150。
- 朱雲漢 (2003)。**TEDS 民主化與政治變遷民調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處專題研究計畫。
- 吳鐵雄、李坤崇、劉佑星、歐慧敏，(1996)。工作價值觀量表之編製研究，台北：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 吳重禮、李世宏 (2004)。「政府施政表現與選民投票行為：以 2002 年北高市長選舉為例」，**理論與政策**，第 68 期，頁 1-24。
- 呂乃基 (2004)。**科技革命與中國社會轉型**，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元墩 (1998)。台灣、大陸與香港三地大學生價值觀及其相關因素之比較研究，**長榮管理學報**，第二卷第一期，頁 1-19。
- 江明修、鄭勝分 (2004)。從政府與第三部門互動的觀點析探台灣社會資本之內涵及其發展策略。**理論與政策**，第 17 卷第 3 期，頁 37-58。
- 汪明生 (1989)。「多元公共認知之研究-社會判斷理論的準實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書 (NSC77-0301-H-110-09R)**，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汪明生 (2005)。**公共事務與管理、理論、方法與應用**，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 汪明生、林錦郎 (2003 年 12 月)。「社會判斷理論運用於衝突管理之案例」。**第四屆兩岸公共事務與跨世紀發展研討會**。高雄 (12.27)：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 汪明生、戴雅明 (2004)。**多元社會下高雄市招商策略認知與判斷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NSCN-93-2416-H-110-008)。
- 汪明生、江明修、陳建寧 (1999 年 8 月)。「公共事務、公民文化與地方發展」，**海峽兩岸首屆公共事務與跨世紀發展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大連 (8.7)。
- 汪明生、江明修、陳建寧、馬群傑 (2006)。「高雄市地方發展與公民文化之研究」，**公共行政學報**，第 19 期，頁 127-168。
- 汪明生、林錦郎 (2001 年 7 月)。「多元社會下的公民文化與地方發展」，**第十一屆環境管理與都會發展研討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 汪明生、陳碧珍、黃慶源、王翔瑋、蘇明敏 (2000 年 8 月)。「多元社會地方發展之公民文化」，**兩岸第二屆公共事務與跨世紀發展研討會/中國北京**。
- 周昌忠 (1995)。**西方科學的文化精神**，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15 頁。

周聖平 (2001)。台灣民眾之物質/後物質主義價值：社經、地區與政治態度差異，台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陽山 (2002)。從公民文化到公民社會。華岡社科學報，第 16 期，頁 1-9。

林錦郎 (2001)。「社會判斷理論與認知衝突典範」。公共事務評論，第二卷第一期，頁 209-228。

林錦郎 (2005)。多元社會之衝突管理—判斷分析之觀點，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倪鵬飛 (2006)。樓市：城市中國的晴雨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孫震 (2001)。台灣發展知識經濟之路，台北：三民出版。

張茂桂、吳乃德、王甫昌、林忠正、林鶴玲、陳茂泰、劉文雄、黃應貴、蔣斌、石磊、瞿海源、洪鎌德、胡台麗 (1993)。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社。

陳文俊 (2005)。民眾與政府的環境正義認知對推動高高屏地區永續發展影響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NSCN94-2621-Z-242-002)。

陳文俊、陳建寧、陳正料 (2006 年 10 月)，「民眾與政府的環境正義認知對推動高高屏地區永續發展影響之研究：以傳染病防治多元整合案為例」，首屆海峽兩岸管理科學論壇，福建省福州大學 (10 月 28 日)。

陳建寧 (1999)。公民文化與地方發展之初探，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建寧 (2007a)。臺灣公民文化之研究：以北高兩市公民的價值觀、道德認知與社會資本為例，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陳建寧、陳文俊、林錦郎、汪明生 (2007b)。多元社會下民眾的公平與關懷道德認知之研究，公共行政學報 (96 年 3 月 22 期，已接受)。

洪瑞斌、劉兆明 (2003)。「工作價值觀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應用心理研究，第 19 期，頁 211-250。

黃同圳 (1993)。青年勞工工作價值觀與組織向心力之研究，台北：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黃鈺堤 (2000)。公共行政意象之研究-三種系統理論範的觀點，台北市：翰盧圖書出版公司。

翁淑緣 (1995)。「台灣北部地區大學生的價值觀與生活型態之研究」，教育與心理研究，第 7 期，頁 95-117。

魯貴顯譯 (1998)。盧曼社會系統理論導引，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

Luhmann, N. (1995). *Social System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謝世民 (2003 年 3 月)。「憲政民主社會的公民理念」，再造公與義的社會和理性空間研討會，台北：時報文教基金會 (3.11)。

瞿海源 (1993)。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計畫：第二期第四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天下雜誌，城市 2.0 台灣 25 縣市，2006/08/30，第 354 期。

遠見雜誌，向南向北走，2004 年 5 月號，215 期。

Almond, G. A., and S.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N. H. (2003). "Unified Theory of Cognition," Chapter 1, pp1-19,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Arkes, H. R. & Hammond, K. R. (1986).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reader: 1-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lding, E. (1988) . **Building a Global Civic Cultur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Box, R. C. (1998). **Citizen governance: leading American communities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Brunswik, E. (1952).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psych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oksey, R.W. (1995). “**Judgment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Cooksey, R.W. & Freebody, P. (1985). “Generalized multivariate Lens model analysis for complex human inference task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35: 46-72.

Dalton, Russell J, Scott C. Flanagan, and Paul Beck, Eds (1984) .**Electoral change: Realignment and dealignment in advance industrial democrac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alton, Russell J. (1984a) . “Cognitive mobilization and partisan dealignment in advance industrial democracies.” *Journal of Politics*, 46:264-84.

Davis, K. and W. E.Moore. (1945) . “Social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242-249.

Doyle, J. & Thomas, S. A. (1995). “Capturing Policy in Hearing-Aid Decision by Audiologists.”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15: 58-64.

Dunn, N. W. (2004). “**Public policy analysis-an introduction (3rd Edition)**,”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Inc.Upper Saddle River.

Esman, M.J (1997) .“Public Administration, Ethnic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Vol.57, No.6pp527~533

Hammond, K. R. (1955). “Probabilistic functioning and the clinical method, ” *Psychological Review*, 62: 255-262.

Hammond, K.R. Stewart, T.R. Brehmer, B., & Steinmann, D.O. (1975a). “ **Social Judgment theory**, ”In M. Kaplan and S. Schwartz (Eds), *Human Judgment and Decision Proces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ammond, K. R. & Joyce, C. R. B. (Eds) (1975b). “**Psychoactive Drugs and Social Judgments**.” New York: Wiley Interscience

Hammond, K. R. (1996). “**Human Judgment and Social Policy**.”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rsch, C. T., Hammond K. R, & Hirsch, T. L. (1964). “Som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 in multiple-cue probability studies,”*Psychological Review*, 71: 42-46.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Inglehart, R. (1970) . “Cognitive mobilization and European identity.” *Comparative Politics*, 3:45-70

Inglehart R.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John, D. (1993). *Civic environmentalism: Alternatives to regulation in states and communities*. Washington: D.C. CQ-Press.

Lee C.M. (2004) . “Changes and challenges for moral educ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Vol.33, No.4, December, 575-595.

Lin, 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uhmann, N. (1986) . “The Theory of Social Systems and Its Epistemology: Reply to Danilo Zolo’s Critical Comments.”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16.

Luhmann, N.(2000) . “**Art as a Social System..**”Californi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slow, A.K.(1954)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olicy PC 3rd (1993). “**Judgment Analysis Software Reference Manual**,” Executive Decision Services, Ince. Albany, New York.

Putnam, R. D. (1993) .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wartz, S. (1992) .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P.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25,:1-65.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Slovic, P. and Lichtenstein, S.(1971) . “Comparison of Bayesian and Regression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Judgment.”**Organization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6,649-744.

Stewart, T.R. (1988). “**Judgment analysis procedures.**” In Brehmer, B.,Joyce, C.R.B.(Eds.) *Human Judgment: The SJT View* (pp. 273-315.).Amsterdam:North Holland

Uslaner, E. M. (1998). **Democracy and Social Capital**. In Mark E. Warren (Ed), *Democracy and Trust* (pp.121-13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hang, X.X. & Lee, C. M.(2002). A Study of ideal citizenship: Taiwan’s case. **Journal of Civics and Moral Education**, 12: 1-32.